

“断裂状”社会的形成及其影响³

——对阿根廷 1930~ 1955 年间的政治分析

吕 芳

主要观点 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阿根廷经济、政治发展的分水岭。本文把 1930~ 1955 年视为阿根廷发展进程中的关键时期。融入世界市场体系的特殊方式及 1930~ 1955 年的政治选择使阿根廷形成了一个对立的“断裂状”社会。

关键词 阿根廷 利益集团 “断裂状”社会

作者 中国政法大学政管学院讲师。(北京 102249)

^X 霍布斯鲍姆把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视为 20 世纪的开始,因为这是 19 世纪西方文明崩溃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阿根廷的 20 世纪是从 1930 年开始的。20 世纪初,阿根廷进入政治动荡时期。随着 1930 年军事政变的发生,阿根廷开始了民选政府与军事政变交替的历史。本文拟对阿根廷 1930~ 1955 年间的政治进行分析,因为这一时期的经济和政治选择对此后的发展道路产生影响。

一 繁荣中的危机

在阿根廷,1930 年前的繁荣是农牧业出口集团的繁荣。阿根廷的肥沃土壤主要集中在潘帕斯地区(它拥有阿根廷 90% 的可耕地)。欧洲殖民主义者把从拉美大陆上搜刮来的财富运往宗主国,而北美洲的殖民主义者致力于在殖民地建立一个自治的经济实体。在瓜分土地的狂潮中,欧洲殖民主义者把土地以“委托征赋制”形式分封给征服者。在阿根廷,到 19 世纪 80 年代,从印第安人那里掠夺来的土地和国有土地全被出售,土地几乎全部落入大资产阶级、大牧场主和外国人(或公

司)之手。20 世纪初,农牧业在农业中已居于绝对统治地位。这种土地制度与美国的土地制度大相径庭。独立后,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土地的法律,出现了一大批自耕农。托克维尔认为,美国自耕农的民主和自由是由他们对土地的占有所支撑起来的。不同的土地制度的结果是:到 1914 年,美国有 63% 的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而阿根廷只有 40% 的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阿根廷的土地高度集中:阿根廷农场的平均面积是美国的 8.4 倍,是澳大利亚的 1.8 倍,而澳大利亚也是一个农产品出口大国。潘帕斯地区只有 1/4 的土地属于拥有 500~ 1 000 公顷土地的小农所有;拥有 1 000 公顷以上土地的大农场占有 61% 的土地,

^X 本文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前院长李铁映、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曾昭耀研究员的指导。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第 9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第 33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Wynia Gary, *Argentina: Illusions and Realities*, Holmes and Meier, New York, 1992; 另一数据为 50.5%,见陆国俊、金计初主编:《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发展》,第 241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Larry Diamond, Juan J. Linz, Seymour Martin Lipset,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Latin America*, Adamantia Press Limited, London, 1989, p. 88

584 个大地主占有全地区 165 的土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阿根廷的 5 000 个大地主垄断了全国土地的半数以上, 其中, 2 000 个大地主拥有的土地竟超过英国、比利时和荷兰 3 国领土面积的总和; 5 个大庄园主每人占据了 10 万~ 30 万公顷最好的耕地和牧场。

大地产制使阿根廷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方式与其他国家不同: 阿根廷以潘帕斯草原作为农牧业产品出口地区直接融入世界市场。与大种植园相比, 大地产制的特征是少数人控制了主要生产资料——土地, 不需要大量劳动力。20 世纪初, 以养牛业为主的地方, 每平方千米不超过两人, 小麦种植地区平均三四人, 人口密度最高的玉米种植区每平方千米也不过 15 人。同时, 大地产主也不需要密集的资本与技术。当其他国家依赖于技术和资本的种植园被跨国资本操纵时, 阿根廷本国的农牧业主却控制了生产资料。高价地租使农牧业主集团完成了资本积累。阿根廷出现了一个在拉美地区极其罕见的、强大的农牧业出口集团。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 地理因素。在巴西、秘鲁等国, 经济多样性和空间分散性使出口集团相互竞争。但潘帕斯地区的农牧业主在地理上相当集中, 与其他地区隔绝, 它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国家”。(2) 文化因素。农牧业出口集团的成员来自本国最有声望的少数家族, 他们毕业于同样的学校, 参加同样的俱乐部和组织——农村协会, 持有同样的价值准则, 这种文化上的相似性增强了集团的凝聚力。(3) 在 19 世纪与内地精英的长期斗争中, 潘帕斯农牧业出口集团大获全胜, 加强了集团内部的认同与凝聚力。阿根廷民族国家的形成, 可以说是潘帕斯地区的农牧业出口集团统一其他地区的过程。(4) 政府本身是作为农牧业出口集团与世界市场的一个汇聚点而出现的。可以说, 它是农牧业出口集团的创造物, 政府在财政和金融上也依赖于这一集团。农牧业出口集团控制国家关税和内河的航运权, 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占支配地位。与世界市场没有直接贸易往来的内陆地区不仅在经济上落后, 政治上也无足轻重。

在农牧业地区, 工业也逐渐兴起。除大地产制的规模效应以外, 1930 年前在国际市场上相对高效的农牧业“粗放型”农牧业对劳动力的低需求

都促进了潘帕斯地区和中心城市的繁荣。19 世纪末, 工业得到了发展。此后, 消费品市场因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进口限制而无法满足城市的需求, 以食品加工为主的小型制造业得到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潘帕斯地区和中心城市的工资都高于许多欧洲国家。一些欧洲人用“他富得像阿根廷人一样”来形容某人的富有。不过, 这一时期的制造业严重依赖国内需求和出口部门收入的增长。依靠外国投资, 食品加工、冶金工业和纺织工业等工业部门得到发展。冶金工业、纺织工业等工业部门大都使用进口原料, 发展水平较低, 没有出现重工业联合企业或资本货物工业联合企业的萌芽。不过, 制造业的发展, 再加上只有少数农民从事前资本主义的生产, 缺乏大量的农村廉价剩余劳动力, 劳工们组织起既独立于资本家又独立于国家的组织, 具有较高的讨价还价能力。

阿根廷已朦胧出现发展的边界。要实现传统经济格局向工业化转型的大规模变革, 需要进口大量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 需要足够的外汇。受国际市场影响, 谷物和肉类这类初级农产品的出口价格不高。阿根廷要维持富裕越来越取决于初级农产品的国际价格及进口肉类、谷物和羊毛的西欧国家的需求量。国际收支的失衡和进口能力的限制要求大力提高潘帕斯地区出口经济的生产率。然而, 如果不实现传统畜牧业向资本密集型的农业商业的转型, 就无法提高生产率。问题的症结在于宏观经济的决策模式。然而, 决策模式在更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国家发展经济的需要, 而是取决于集团之间的力量斗争和国家对集团的倾向性。

农牧业出口集团依靠强大的力量维持着“寡头统治”, 压制中产阶层, 尤其是劳工组织的政治

陆国俊、金计初 主编:《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发展》, 第 241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

赖泽源 等著:《比较农地制度》, 第 85 页,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6。

[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 第 5 卷, 第 406 页,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这方面的论述参见 Davide G. Erro, *Resolving the Argentine Paradox -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1966 - 1992*,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London, 1993, p. 28 and James W. McGuire, *Peronism Without Peron*, Stanford, California, 1997, p. 31.

社会学理论认为, 冲突有助于建立维持社会或群体的身份和边界线, 见 L. 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参与。工业部门的日趋壮大使政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为了应对中产阶层和劳工组织的参与危机，保守党通过了1912年选举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寡头精英愿意与其他阶层分享权力。他们认为，新的“游戏规则”丝毫不会影响其统治。根据选举法改革的议会辩论情况，保守党确信，该党将会成为多数党并领导一个联合政府。^b事实也是如此。在1916~1930年激进党执政期间，议会共提出90项有利于畜牧业主的议案，而60%的议案是由激进党提出的，11%的议案是由进步民主党提出的，保守党提出的议案只占29%。而且，激进党与保守党的观点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保守党人主张适度的进步和诚实的政府，激进党人则主张温和的纲领和廉洁的政府，但是人们很难区分这些闪烁其词的大道理后面的差异。激进党内部的分歧反而更明显。^b

保守党因过分自信失去了对政权的控制，但仍控制着重要的资源、经济权力、军队、新闻机构、大学，等等。只要寡头精英的根本利益受到损害就会起来反抗，因此，激进党政府的合法性是不确定的。激进党政府对保守党的态度对新政权的巩固和政治稳定是举足轻重的。激进党执政的前提是不损害保守党的利益。执政前期，激进党的政策并没有触及保守党的利益。后来，伊里戈延政府为了获得劳工的支持，转向了“民众主义”，通过增加国家开支维持个人的声望。但是，随之而来的党内贵族派领袖阿尔维亚尔的执政又恢复了保守党的实际支配权。到20年代中期，伊里戈延与阿尔维亚尔的分道扬镳预示着保守党的黄金时代即将结束。伊里戈延向其追随者灌输对他个人的崇拜，使激进公民联盟分裂成追随他的“要人派”与反对他的“非要人派”。1928年，为扩大选民基础，伊里戈延采取了几项迎合城市劳工的政策，得到了57%的选票并再次当选。这些选票更多来自劳工组织，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来自中产阶层。由于议会仍然是保守政权及其选举舞弊的产物，伊里戈延利用“联邦干预权”指定省长。在其任内，经他免职的省长达20人，他用忠诚的激进党人取而代之。^m激进党本来在下院占有多数席位，此时可望在上院也占有多数席位，这威胁着保守党的阵营。传统的农牧业出口集团几乎失去了所有通向政治权力的道路。保守党认为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便联合军

队发动了1930年政变。

二 两个“国家”的形成

1930年军事政变以后，阿根廷又回到了1916年以前农牧业出口集团一统天下的局面。激进党被禁止参加选举，农牧业出口集团通过暗箱操作继续维持对政权的控制。正是由于1930~1943年间农牧业出口集团继续压制劳工的政治参与及利益分配，才引起20世纪40年代庇隆主义的崛起，也正是庇隆主义与反庇隆主义的强烈敌意，才使阿根廷成为一个“断裂状”社会。

在拉美国家中，阿根廷劳工最先登上历史舞台，工会组织规模最大，衡量劳工运动力量的几个指标都列首位（表1）。在1902年，阿根廷爆发了由2万多工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总罢工。20世纪头10年共爆发了10次总罢工。1907~191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共爆发了785次罢工。在伊里戈延1916年上台之前，平均每年的罢工不下100

表1 1920年人口超过2万的中心城市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与位次^b

智利	27.6(3)	墨西哥	12.6(5)	乌拉圭	27.8(2)
秘鲁	5.0(8)	巴西	13.4(4)	委内瑞拉	11.7(6)
哥伦比亚	8.9(7)	阿根廷	37.0(1)		

1925年拉美国家的工厂雇用率与位次^b

	工厂雇用率	占经济自立人口的比率
智利	82 000(4)	6.1(3)
巴西	380 000(1)	3.7(4)
墨西哥	160 000(3)	3.2(5)
委内瑞拉	12 000(8)	1.5(7)
乌拉圭	39 000(6)	7.0(2)
哥伦比亚	47 000(5)	1.8(6)
秘鲁	21 000(7)	1.2(8)
阿根廷	340 000(2)	8.3(1)

次。^p1930年以后，劳工队伍进一步壮大。工业公司从1935年的38 456家发展到1946年的86 440

^b Peter H. Smith, *Argentina and the Failure of Democracy*,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London, 1974, p. 92

^b 同，第8卷，第19页，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

^m Peter G. Snow and Luigi Manzetti, *Political Forces in Argentina*,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1993, p. 15

^{b b b} Ruth Berins Collier and David Collier, *Shaping the Political Aren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1991, p. 66, p. 67, pp. 92-93

家。同时,劳工人数从 43 58 万人发展到 105167 万人。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已经中止,移民中的多数人来自内陆省份。劳工可以获得选举权,但考虑到政权的特点,他们并不能对政府施加有效影响。劳工缺乏政治参与的途径,也无法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在 1930~ 1945 年间,阿根廷的实际工资支出几近停滞,但制造业的就业却剧增。^q当工资的增长落后于通货膨胀时,实际工资反而下降了。面对雇主和政府的压制,劳工想要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无异于白日做梦。这些劳工成为潜在的政治力量。1943 年军官团发动政变推翻了农牧业集团的“寡头统治”。1917 年“十月革命”震撼了世界,阿根廷国内普遍存在着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爆发国内革命的恐惧。在 1944~ 1945 年底隆主义孕育的年代,庇隆坚持对国内外实权派做工作,希望通过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让劳工组织参与政治决策机制,在全国达成共识和团结一致的情况下进入新时代。然而,庇隆的全国和解和团结的主张遭到反对。阿根廷错失了建立“达成共识基础上的上层革命”的机会。^b劳工运动发展最早的阿根廷却“最晚组织工人阶级参政”^b,这是 1945 年爆发“自下而上”社会革命的原因。这场社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阿根廷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

庇隆主义影响了阿根廷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这不是偶然的。可以说,是时势造就了庇隆,是劳工组织造就了庇隆。如果说劳工运动的发展离不开庇隆的政策,那么,庇隆在政治上的发展也归因于劳工的政治参与。在 1943 年军事政变期间,劳工运动是分裂的。但是,作为一名精明的政治家,庇隆对劳工的潜力做出了正确的估计。在庇隆任劳工和社会保障部部长期间,其助手是一位能干的西班牙官僚。他的任务是收集并分析统计数据。这些统计数据表明,将来民众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与城市劳工组织的发展相联系。以下的统计数据说明了这一点。(1) 1947 年,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人数占阿根廷总人口的 68%,其中仅城市劳工人数就占阿根廷总人口的 40%。^b登记的工会成员从 1936 年的 287 725 人增加到 1945 年的 528 523 人。(2) 劳工的内部构成发生了变化。1914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区的人口中一半出生于外国,仅有 1010 的人口来自内陆省份。然而,统

计数据表明,到 1947 年为止,有 136 8 万人从内陆省份迁移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k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区的外来移民中,来自内陆省份的占 29%,而来自国外的移民只占 26%。75% 的非熟练劳工、60% 的准熟练劳工及 50% 的熟练劳工是外来移民,绝大多数移民初来乍到。^l国内移民潮改变了人口的地理分布和职业构成。一方面,这破坏了代表农牧业主利益的保守党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城市劳工(主要由体力工人组成)开始崛起。他们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但需要寻求一个新的庇护者。如彼特·施密斯所说:“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和 40 年代早期,领袖们……通过已经确立起来的宪法政治制度来促进城市大众的利益。在 1943 年之前,这些领袖们,在每一次关键时刻都遭到统治的保守党的阻拦;他们探求的制度,尤其是议会,是衰弱和不讲信用的。重要的问题是社会上动员起来的集团寻求政治参与,但是却无法接近权力。……庇隆走上政治舞台是生逢其时。”^m

是时势造就了庇隆,是劳工组织造就了庇隆,而不是有了庇隆,才有劳工组织的胜利。所以,庇隆政府的政策偏向劳工也是不难理解的。劳工、新兴民族资本家、一部分中产阶级、军队和天主教会结成了联合阵线,而农牧业出口集团、外国企业、国内大企业和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受到孤立,只有为数极少的大工业家是庇隆主义的热心支持者。庇隆的民众主义在经济政策上的一大特点是:通过宏观政策手段实现收入由农村向城市、由农业向工业的再分配。庇隆推行了一些具有民族主义与改良主义色彩的政策措施(如发展民族工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收回部分外资企业,限制大农牧业主和大出口商的利益,等等)。庇隆任总统期间,无论从心理上还是物质上都使劳工受益。1945

^q William C. Smith,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Argentine Political Economy*, Stanford, California, 1989, p. 25

^b (阿根廷)豪尔赫·卡斯特罗:《第三次革命》,第 22 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b 同,第 6 卷(下),第 102 页,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

^b Lars Schoultz, *the Populist Challenge*,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Chapel Hill and London, 1983, p. 32

^k Daniel James, *Resistance and Integr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6, p. 8

^l 同 ^k, p. 124

^m 参见 ^k, p. 21

年, 时任劳工部部长的庇隆实施了两项措施: 建立全国赔偿协会, 实行最低工资制; 建立的奖金制度规定, 年底时给每个劳工发一笔奖金, 数目为当年工资的 10%。所以, 在庇隆执政期间, 劳工收入飞涨。^a

劳工福利的增长使农牧业出口集团和大资本家付出了代价。庇隆说, 新阿根廷有两种敌人, 一种是外国帝国主义, 一种是阿根廷国内寡头, 这些富人一度控制了本国经济。庇隆指出: “直到现在, 经济一直服务于资本, 从现在起, 资本将要服务于经济。”^b 现在我们建立了新阿根廷, 因此, 国家就没有寡头们的份了。”庇隆认为, 资本主义制度是对财产的滥用。^c 迪特拉曾经提出告诫: “阿根廷制度的一个危险因素是, 经济上的右翼在政党选举方面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尽管激进党的计划并没有威胁到右翼, 但是, 右翼的无防备地位是很不舒服的, 有时会产生推翻政府的欲望。”^d

“民众主义”政策使劳工组织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变, 也引起了农牧业出口集团和跨国资本家的怨恨。1955 年, 庇隆政权被推翻, 但是, 这一段历史在整个 20 世纪都留下了无可磨灭的痕迹。阿根廷分裂为两个“国家”。对于农牧业出口集团而言, 1943 年之前是其黄金岁月; 而对劳工组织而言, 这是一个深受压迫的时期(只是在 1943 年以后, 一切才发生了改变)。随着庇隆的下台, 这两种冲突的观念形成两种不同的亚文化。^e 在农牧业出口集团看来, 人的价值牢固建立在等级地位上; 而在劳工组织看来, 机会平等是不容置疑的。一个被称为“过时寡头”, 支持“自由主义”, 赞成自由贸易, 反对广泛的政治参与, 主张精英主义; 而另一个支持“民众主义”, 自称“无衫汉”, 主张关税保护, 经济平等, 大众的政治参与。这已不再是农牧业出口集团与劳工组织之间的战争, 而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 一个“国家”的人民只能接受既没有庇隆的, 又没有庇隆主义的世界, 而另一个“国家”的人民只能生活在庇隆的世界。^f

两个“国家”之争不仅仅是单纯的物质利益的冲突, 同时也是价值和文化的冲突。就冲突的性质而言, 价值冲突比物质冲突更难平息。

一般观念中的稳定社会, 其实是持续的、交错发生的各种冲突的结果。也就是说, 社会集团的种类五花八门, 一个人可能同时忠诚于语言、宗教、

地域等不同集团, 每一种冲突形式都阻碍着其他冲突。个人对所处集团所产生的形形色色的忠诚交叉重叠, 降低了各集团间的敌意与疏离。这就是所谓的“横切状”社会。不过, 如果不同集团的分裂线是重合的(如身份、地位、经济福利、政治权力等息息相关), 各种冲突将会互相加强, 那么社会就可能面临危机。这就是所谓的“断裂状”社会。“断裂状社会”比“横切状社会”的冲突更激烈。^g 社会中那些不同的对立就像不同的波纹拍打着湖的对岸, 如果一个波的波峰与其他波纹的波谷相遇时, 它们就互相抵消; 但如果波峰与波峰相遇、波谷与波谷相遇时, 它们就互相加强。^h 在 1955 年以后, 阿根廷成为一个利益极端化的“断裂状”社会。

三 “断裂状”社会的利益格局

在庇隆执政的 10 年间民众主义留下了两份遗产: 一是政治上动员起来的、人数众多的劳工, 与人数虽少、但力量强大的农牧业出口集团的对立; 二是一个过度保护和缺乏竞争力的、但能促进就业与稳定的工业部门, 与一个出口创汇能力不足的、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的农牧业出口集团的对立。然而, 庇隆的“悖论”是: 他在言辞上猛烈攻击农牧业出口集团, 引起后者的敌意与愤怒, 但他又没有真正削弱后者的权力; 他把与工业资本紧密相连的劳工大众动员起来, 但他又没有根本改变“农业国”的社会结构。庇隆虽然把农牧业出口集团称为“过时寡头”, 是“新阿根廷”的敌人, 但“农牧业寡头”在“新阿根廷”并没有经受城市工商

^a 1943~1946 年, 阿根廷实际工资增长了 4%, 1945~1949 年, 实际工资上升了 22%, 但劳动力仅增长了 6%。尽管工资在 1949~1952 年曾经下降, 但 1953~1955 年又上升。到庇隆政权结束时, 工人工资比 1946 年高出 30%。按工人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工资从 1946~1948 年占国民收入的 41% 上升到 1952~1955 年的 49%。

^b George I Blanksten, *Perón's Argentina*, Russell & Russell, New York, 1967, pp. 252-253.

^c Edgardo Catterberg, *Argentina Confronts Politic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London, 1991, p. 57.

^d 有的学者说是庇隆主义者与反庇隆主义者之争, 也有的学者认为是“民众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 其核心是一致的, 即阿根廷存在着两种政策、两大集团的严重对立。

^e Guillermo A O'Donnell,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79.

^f 国外一些学者称之为“分裂状社会”和“横切状分层”。

^g [美] 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 第 64 页。

业阶级那样的打击。^h 人们都以为,庇隆政府会坚持对大地产的再分配。然而,庇隆从来没有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政府于1946~1950年间赎回并转让给农民的土地计45万多公顷,因这一措施受益的家庭不过3200户,与全国100多万户无地劳动者相比微不足道。ⁱ 社会结构转型依然是“新阿根廷”的大问题。威士曼在《阿根廷的逆向发展》中指出,庇隆的两项政策是阿根廷逆向发展的“罪魁祸首”:一是以职团结构动员劳工,二是进口替代政策引起了资源的无效配置。^j 然而,威士曼只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庇隆始终没有进行土地改革以改变“农业国”的经济结构。

40年代庇隆上台时面临两种工业化的选择:一是以基本工业为基础的,在战时由陆军军官发起的国防工业化,二是继续轻工业化。农牧业出口集团与跨国资本家的强大力量对政权构成了潜在威胁。为了满足福利主义的分配政策,赢得劳工组织的广泛支持,庇隆作出了后一种选择。^k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囿于国际贸易受阻,进口消费品不足,阿根廷积聚了一笔外汇。这笔外汇中的大部分用于购买进口替代工业化所需的机器与技术。对进口替代工业的激进保护使民族工业改进了设备,出现了经济繁荣。然而,到1949年,经济出现恶化。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开始暴露。(1)进口替代工业化主要集中于轻工业,其企业规模小,缺乏规模经济效应。1946~1953年,新增工业企业715万家,大多为拥有5~20个劳工的小企业。据统计,1954年工业企业雇用人数平均只有8.2人。产品面向国内市场,缺乏出口创汇能力。大型的钢铁工业和石油化工工业发展滞后,严重依赖于进口燃料和钢材。五六十年代阿根廷进口了所需燃料的65%左右。1957年消费了1400万立方米燃料,将近1000万立方米来自国外。^l 在地区分布上,工业发展集中在沿海地区,尤其集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及其近郊,而内陆经济发展滞后。这种“二元”经济结构在过了一定阶段后成为发展经济的桎梏。(2)发展工业必需的技术和设备等的进口依赖初级农产品出口所获得的资金,而初级农产品市场受国际市场的需求和价格的影响。(3)阿根廷国内劳动力市场紧张,工会活动活跃,而庇隆采取高福利的分配政策来回报并维持劳工对他的支

持。(4)通货膨胀日益严重。战后初期,阿根廷的物价相对平稳。1947年以后,通货膨胀率上升,公共支出扩大,财政赤字上升。经济危机在1951年出现端倪。由于硬通货稀缺出现了燃料、原材料和资本货的问题,工业现代化出现障碍。

50年代后期,面对“农业国”和“工业国”的两难选择,阿根廷开始积极引进外资以深化进口替代工业化。阿根廷出现了新的经济结构,形成了3个生产发展部门:跨国公司控制的部门、国家控制的部门和本国私人资本控制的部门。跨国公司的投资集中于新的、有特殊保护的领域,专门生产阿根廷国内市场上供不应求的产品。^m 1959~1961年²⁶³引进的外资流向石油化工和汽车制造业部门,极少数外资投向已有的部门。外债主要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MF)。1955年以后,外债数额逐年增长。MF要求阿根廷推行消除通货膨胀、寻求国际收支平衡的经济稳定政策。根据MF的要求,阿根廷必须与其签订一项协议:如果阿根廷没有严格执行经济稳定计划,它将被拒绝得到新的贷款。稳定化政策的实质就是通过减少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抑制需求来偿还外债。

新的经济结构仍然依赖于传统的农牧产品出口换取外汇以偿还外债和为工业发展积累资金,而这种依赖性正是深化进口替代工业化所要根除的。20世纪60年代以前,农牧业产品的出口额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高达90%以上ⁿ。由于农业技术水平低下,随着土地肥力的衰竭,农牧业产品成本日趋增加。过去曾是经济腾飞主要动力的潘帕斯地区的农牧业出口集团,现在却越来越成为工业化进程中难以逾越的障碍。

阿根廷经济中存在着一个特殊问题:出口农牧业产品——谷物和肉类,正是一般民众的主要

^h George I. Blanksten, *Perón's Argentina*, p. 249.

ⁱ 肖楠等编:《当代拉丁美洲政治思潮》,第249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j Carlos H. Waisman, *Reversal of Development in Argentina*, pp. 117-127.

^k 同^b,第82页,第106页,第117页。

^l 徐文渊、陈舜英、刘德:《阿根廷经济》,第1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消费品。^d这与美国南方种植棉花或一些地区种植其他农产品不同,因为肉类的价格占阿根廷消费者物价指数的40%。^d

阿根廷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稳定性计划通常要求降低通胀,这就迫使政府调整汇率、控制货币发行量,使一部分收入转移到农牧业出口部门。调整的影响不仅是紧缩性的,而且会引起滞胀。

在这种形势下,阿根廷形成了不同的利益格局。劳工组织与农牧业出口集团形成了阿根廷经济的两个极端。两极中间依据利益的共生关系分别排列着其他的利益集团。依靠国家干预和关税保护的小制造业主及内陆地区的中产阶级与劳工组织结盟,而跨国资本家集团与农牧业主集团结盟。这两大阵营的对抗构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此外,资本家(民族资本家与跨国资本家)内部出现了分裂,资本家与劳工组织、劳工组织与中产阶级

之间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对立与冲突。经济政策像钟摆一样左右摆动。当钟摆摆到一边时,政府执行保守的(或用阿根廷人的词汇“自由”的)政策(如浮动汇率,低关税,鼓励发展农业,控制工资,减少政府支出);当钟摆摆到另一边时,政府就执行“民众主义”政策(如控制兑换,农产品低价格,高关税,鼓励发展制造业,高工资和增加政府支出)。两极之间的争端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和利益之争,而更多的是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之争,也就是“民众主义”还是“自由主义”之争。

(责任编辑 沙 萨)

^d Guillermo A O'Donnell, *State and Alliances in Argentina, 1956-1976*, pp. 3-33 选自 *Counterpoint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Indiana, 1999

^d Davide G. Erro, *Resolving the Argentine Paradox -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1966-1992*, p. 28